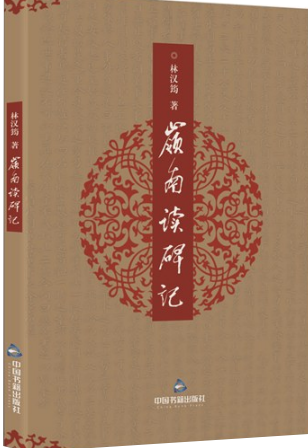


书里书外

岭南「碑语」与「湘土」情结

——谈谈《岭南读碑记》



吕高安

湘人，自古就有“耐得烦、霸得蛮”的特质；湘人，无论走到哪儿，都会显现其独特的精气神。近日，读罢湘籍作家林汉筠的历史文化散文《岭南读碑记》，让我看到一个走出湘地在他乡打拼30多年的作家，和其内心深处“钻进”的“湘土”情结。

“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性，未勒勋绩。”（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碑刻，作为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独特形式，用形象的方块字记叙历史、讲述故事，成为一种显现“风韵意态”的艺术载体。

读碑，则是一种心态，需要“耐得烦”，在变化多端的字体形状里，与古人对话，与先贤探寻天道，共描人伦。从红丘陵里成长的作家林汉筠，在三十年前，辗转岭南东莞，开始了羁旅他乡的谋生与“谋心”。三十年来，他以历史文化散文的面孔亮相，并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他所创作的反映当地碉楼《百年听风》（云南大学出版社）、为东莞正名立言的《喊魂》（敦煌文艺出版社），传承当地文化，被评论家认为，其文化散文“堪称东莞文化品格和人文气质的教科书”。

近五年来，不惧滚滚红尘诱惑，能耐得住寂寞的他，却离开书斋，不厌其烦地行走在岭南大地，将笔锋划及散落在田陌、荒山或者博物馆里的石碑，对岭南尤其是他生活30多年的东莞大地重要碑文进行解读。将一个个藏在冰冷石碑里的文字，挖掘出来，构筑当时的场景与当下的思考。今年初，这本《岭南读碑记》精彩亮相，成为首本解读碑文的文化散文集，他本人也被人称为“读碑散文创作第一人”。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首先是一个学者，要储备学者的学识，形成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他们的作品，要给读者带来强烈的现场感，就得深入生活。这本《岭南读碑记》，虽然只写了20块石碑，可用了整整五年时间。深入生活，又抽离生活，以一个后来者的身份抚碑、读碑，又以一个局外人来理解碑文，观察与审视碑文，从而挖掘出更多的生活细节，搭建更生动的生活场景，立体地呈现出耸立在岭南大地上的碑语，拓宽了作品本身的内容。

文学创作不只是以解读和叙事为目的，而应以思想和艺术为准则。作家有责任用文学来反映生活的本质与真相，有责任讴歌真善美，引领人心向上、向善。在林汉筠的《岭南读碑记》里，我们不难发现蕴藏在文字里的“淳朴正义”，及其延伸的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

他笔下的《却金碑》，是正直廉洁的东莞县官李愷贯穿千年的举动；《还金碑》，是拾金不昧、厚德载物的袁友信，用一壶茶的阳光来昭示这座城市的精神。这些嵌进石碑里的文字，在他的笔端鲜活起来，成为岭南美德与佳话。

“天下治世，效忠诚信为大”。在解读《可轩题识碑》时，他通过自己的母亲和可园主人张敬修的母亲明暗两条线索，进行铺展叙述，情感饱满，不失细腻。在解读《仁孝碑》时，他想到家乡那块让乡亲们引以为骄傲的“母亲树”，母亲与“我”在“石树”边上的对话，将这个独具特色的“石树”作为传递“孝道”的重要载体，越过世间冷暖，讲述人间温情。

残存于鸦片战争博物馆内的节马碑，已断成三节，文字也较模糊。为了解读这块碑文，他先后多次深入到石碑的“原产地”虎门沙角及鸦片战争博物馆，了解碑后的故事，将战马的刚烈与民族英雄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气节，瞬间键进碑里。他写道：阳光衬出那个姿态，即使相隔了180年，依然还能听到一代英雄与一匹战马叩击大地的声音。

一个从三湘四水走出来的宝庆汉子，一个奋战在岭南的散文作家，林汉筠以“吃得苦”的心态，“正其谊，不谋其利”，不断创新创作方式方法，将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与博大精深岭南文化有机地融合起来，自觉运用两地文化创作，倾心倾情抒写着两地佳话。

（《岭南读碑记》，林汉筠 著，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当历史与军事碰撞

——评《中国兵学通史·先秦卷》



白志伟

七卷本的《中国兵学通史》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是对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一次系统性研究和总结。《中国兵学通史·先秦卷》作为该系列的首卷，无论是对传统先秦史或是兵学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创新和启发意义。

兵学史作为历史学与军事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之难度，不可谓不大。故而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兵学史的关注与研究严重不足。直至20世纪70年代，随着银雀山《孙子兵法》与《孙臧兵法》汉简的出土，对中国兵学思想家的研究才逐渐受到重视。其后，一系列研究著作相继出版。但这些著作对于先秦时期兵学的研究却往往论述简略，缺乏系统性，《中国兵学通史·先秦卷》则及时地填补了这一空白。

体例的创新性

《中国兵学通史·先秦卷》，论述了由古史传说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兵学的产生、发展、演变以及突出成就。

不同于以往以朝代或人物为纲的著作体例，本书采取了以兵学时代发展为主线辅之以重点问题单独论述的写作方式。如在已有的兵书史研究中，本应附于第五章“春秋时期兵学思想的繁荣”下的《孙子兵法》，在本书中独立成章，并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使读者仅从体例上就能感受《孙子兵法》于中国兵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这种体例，使得本书的内容相较于此前的兵学史著作更显得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具体而言，本书主要由军事技术、作战方式、重大战役以及兵学理论等四部分组成，其中兵学理论是本书的重点，对于先秦时期的重要兵学著作，基本都进行了单独探讨。此外，不同于以往研究只注重于兵学著作的研究，作者还着眼于各类非兵学先秦典籍中兵学思想的挖掘，例如对《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中兵学思想的撷拾。尽量照顾到各类先秦典籍也是本书的重要特色。

内容的丰富性

由于体例的创新，本书的内容更加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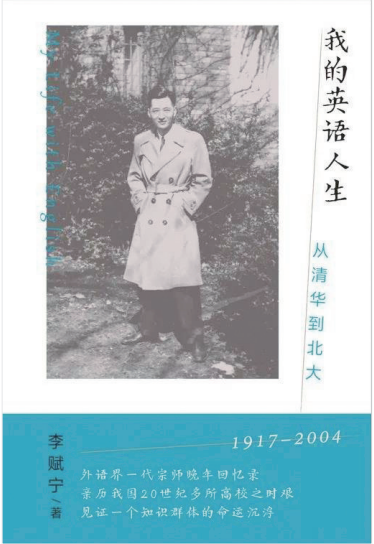


走马观书

《河湾》
张炜 著 花城出版社

《河湾》是作家张炜又一长篇小说力作，以家庭这一“社会的最小单位”为核心展开故事，写尽网络时代的步步惊心与诡谲神奇。

主人公傅亦街心中藏匿了一个最大“异人”，就是自己隐秘的爱人洛珈。他与她的家族都曾置身于半岛的历史迷局中，这或许造就了他们奇特的两性关系，以及在生活中既疏离又拼搏的矛盾抉择。余之钙与妻子苏步慧同为傅亦街的挚友，他们寻得一处至美的河湾，却又希望自己“一辈子都不跟‘田园’‘回归’这些陈词滥调沾边”。傅亦街见证了余、苏夫妇从激越到颓丧、从顶峰到谷底的全过程，怜愤痛惜：怎样走向忽切坚卓的人生？



第一，本书摒弃了通史类著作常见的内容广泛却深度不足的通病。作者在着眼于武器装备、军队体制、作战方式等兵学发展要素的同时，更加注重对时代背景、经济规律、政治逻辑等方面的探讨。如在对西周兵学体系的论述中，作者不但分析指出了经济制度——井田制是“寓兵于农”建军思想赖以生存的基础，而且详细论述了井田制与兵役制度结合的具体操作。这种论证方式使得本书更加学术化，深度也大大增加。

第二，本书在内容呈现上秉持了严谨的学术态度，无论在史料的选择、抑或论断上都做到了博采众家，不作妄断。例如，在论述《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时，出现了春秋说、战国说、西汉说的争议，在介绍完各说基本观点及证据后，作者言：“《孙子兵法》具有一个不断成书的过程，其初次成书可能是春秋末期的孙武。同时，综观《孙子兵法》全书，其受战国百家之学的影响，亦是明显可见的。”

第三，本书非常重视史料多样性和丰富性。本书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不但运用传世文献，还参考了诸多出土文献。例如在《“老子”的兵学思想》一节中，作者不但简要说明了王弼本、河上公本、傅奕本等传世本，还向读者介绍了马王堆本、郭店简本以及北大简本的《老子》。

学术的严谨性

本书从不同层面均体现了作者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本书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兵学通史·先秦卷》对前人研究成果力求全面而概括。如对《孙子兵法》成书年代的考辨，总结了从宋代梅尧臣，历经叶适、陈振孙、全祖望、姚际恒直到清代姚鼐的观点；在今天的研究上也依次阐述了代表性学者齐思和、李零、郭化若等的观点。

其次，概念清晰，表达严谨。例如在第一章中，本书便严格区分了战争与武力冲突，将氏族社会中的“血亲复仇”划归于武力冲突，并运用战争的基本要素来解释这一划分。作者指出：“这类武力冲突的目的很单一，其既无攫取私有财产的因素，亦非以从事阶级奴役为基本宗旨，与战争起源的两个基本要素（私有财产的出现与阶级的分化）并不相涉。”

最后，严谨性与概括性能够很好结合。作者在严谨的学术态度下，对先秦的兵学内容进行全面研究，对先秦兵学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结语部分仅用“竟于道德”“遂于智谋”“争于气力”等数个词语就总结了先秦时期兵学文化的嬗变轨迹，简明扼要。

总之，《中国兵学通史·先秦卷》在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分科史学的写法，直观明了地向读者呈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兵学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脉络。本书不仅是一部系统研究先秦时期的军事学著作，更是一部综合研究先秦时期的科学技术、战略政策、地理地缘等的历史学著作，对今后先秦史、兵学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中国兵学通史·先秦卷》，白立超、黄朴民 著，岳麓书社出版）



《我的英语人生：从清华到北大》
李赋宁 著 商务印书馆

本书为著名英语教育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李赋宁的口述自传。李赋宁教授的人生经历很有代表性，可以说是近现代英语教育史的一个缩影。

他的中小学曾在多地求学，大学就读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等几所高校，毕业后攻读研究生，之后被聘为西南联大外文系讲师。1946年，赴耶鲁大学留学。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到北京大学工作，任北大副教授长。

在英语教育面临转型的当下，以这本自传切入，回顾我国百年英语教育的历史，镜鉴过往，烛照未来。

图有所得

诗意与苦难共存的南方记忆——读《南荒记》

姚乐旗

《南荒记》的故事，背景设置在南方大山深处一个隐匿的村子，依据村中的“细伢子”（小孩子）刘务的视角展开，以数十年积累的南方生活经验与老到的文笔，创作出一种诗意与苦难兼具的故事风格，带给读者新颖的审美体验。

《南荒记》的自然风光，将那股沁人心脾的美感氤氲在字句之中。“溪水从石壁上溅落，日光下幻出五彩光晕，腾起的水雾消融于木叶草石间”，这类词句在书中比比皆是。而且，除山清水秀以外，还有数不胜数的生灵在读者眼中跃动，它们作为大山的一部分，使作家心中的南方和艺术重构的南方，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活在这山明水净的村庄里的人们，具备着勤劳、善良和淳朴的美德。落雪天里，刘王氏踩着积雪，送给高烧的刘务一个珍藏了大半年的橘子，而这样的橘子却是救命的吃食。三麻子的爹绰号利猴子，为了救刘务的命，选择破了祖师爷传下来的禁忌，用了一生只能用三次的强盗水。大山里的人们奉行的便是这样一种生存法则，他们坚忍、耐苦，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存能力，以最少的资源养活自己和家人。

除了诗意的山水与人物，《南荒记》还特别聚焦了地域神秘浪漫的“巫文化”。小说中村民的世界观往往带有超验色彩，认为万物皆有灵性。也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中，村中的祖祖辈辈对客观世界里的一草一木充满了敬畏。譬如刘务拜了一块大石头做干娘，并获得了个新名字叫“岩保”。并且，在这种“万物有灵”的世界观中，最为常见的是“预兆”观念。大樟树上鸦的叫声，白鹭在巢里发出的不安声响，刘务弟弟的梦……都传递着不可解读的预兆。

刘鸿伏并没有拘泥于对作品的诗性雕琢，小说中，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流淌其间，具有神秘色彩的环境、超现实的荒诞情节，都指向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呈现出那个年代南方大山里人们苦难的生存状态，凸显无处不在的生命的坚韧不拔与百折不回，唤起读者的共鸣。

《南荒记》共十六章，在那些唯美动人的秀丽风光的背后，读者往往会感到一种浓重的悲凉气氛绵延其间。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国家尚未安定，物质仍

好书摘读

养成坐图书馆的习惯非常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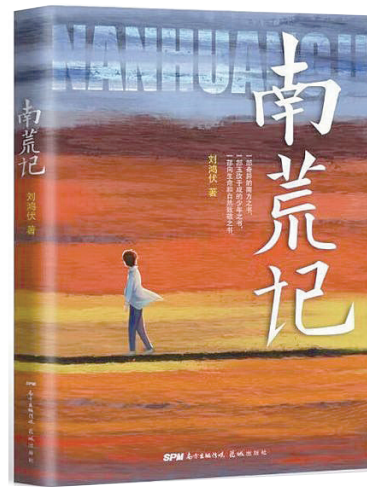
顾诚

几十年来能做出一些成绩，得益于勤奋。我觉得养成坐图书馆的习惯非常重要。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除了上课和其他必须参加的活动外，往往是整天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古籍部和科学院图书馆看书。早晨带上稿纸、笔记本和一个馒头蹬车直奔图书馆；中午休息时吃个馒头，在附近转悠一会儿，继续阅读摘抄史料，直至闭馆才回家。读书的方法是提出书后，先翻阅一遍，遇到有价值的史料，把事先准备好的小纸条夹在书内作为标记，大约看到一半，就动手抄录。一条史料抄在一张稿纸上，半天时间差不多总是七八张（按行不按格抄写），字数少的可达到十张，一天下来总有十几张；笔记本大抵是记下与当时研究问题无关的零星史料或简要备忘录。晚上一定要把摘抄的材料仔细阅读一遍，遇有语句不通等情况，可能有误字漏字，用红笔画出，第二天再核对原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摘抄史料时的笔误。

检阅所抄材料还会发现有的问题应从其他史籍中寻找印证，即记于笔记本上，以便及时提取书籍。骑自行车去图书馆，冬天是最困难的，有时顶风而行实在费劲，严寒甚至会冻得手指麻木。这种工作方式确实有点辛苦，但在图书馆中一坐，好书在手，乐在其中，回家后检阅收获，每有意外之喜。且不说关系到历史上重大问题的史实，就拿我在《明末农民战争史》后面附的“大顺政权所设各地官员表”来说，多数是从地方志的“灾祥”“兵燹”“纪事”之类记载中查出的，每找到一个“大顺政权任命的地方官员的名字和职务都能使我高兴一阵。这部书出版后，我在读书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些新的史料，可以为该表补充十名以上官员。坐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潜心研读，有时还需要到外地图书馆去查阅。

为了写《南明史》，1992年，我到昆明去阅读云南省图书馆的藏书和参观云南省博物馆的藏品，因须阅读的书籍



旧匮乏，因此小说中最突出的苦难，就是物质的稀缺给人带来的痛楚。饥荒年代没有粮食，很多人患上水肿，拖不了几个月就会埋入黄土。村中最流行的食物是红薯，一年四季都是主食，过年时才有机会吃到白米。

更为重要的是，《南荒记》在对苦难的书写上，有诸多含有魔幻色彩的情节建构，这种情节突破对一般现实的直接复刻，将现实与虚幻交织，呈现出梦幻的特征。例如夜里，村里大部分人开始梦游，光棍毛五啃床脚，满嘴是血，刘务爹去河里倒毒药等。个中缘由，书中并没有详细解释，只有刘务奶奶解释是“灵魂出窍”的缘故。

比贫穷更抓人肺腑的，是死亡的苦难。小说中涉及死亡的情节很多，但又都不相一致，各有其特点。主人公刘务自己就有过好几次的死亡经历，起麻疹、被斧头劈中、头倒插到红薯地里……但每次都是“从阎王殿里打了一个转回来”，这些死亡经历，都成为了刘务成长的助推。死亡越是如此正常，如此普遍，越是隐喻这片土地的无常性，正如在刘务爹大难不死后的一段文字：由生忽死，死而忽生，死生祸福，旦夕逆转，命运波诡云谲，全不由人。

这是“一部记录苦难与命运的血泪之书”，可以说，刘鸿伏深刻地理解了乡土小说作家的使命，以灵动的文学思运和鞭辟入里的生命思考，将表达诗意和反映苦难都做到了极致，为南方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

（《南荒记》，刘鸿伏 著，花城出版社出版）

较多，连原来计划途经贵阳时去安龙实地考察一下都限于时间只好作罢。有时因情况不明，重要史籍会失之交臂，如研究明代的耕地数字，我提出明代疆土由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分别管辖的论点，虽然依据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他相关记载的材料加以论证，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万历十年山西巡抚辛应乾主持编制的《山西丈地简明文册》，原书就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这部书的前三册是山西布政司所辖各府州地亩及征粮数，第四册和第五册则是山西都司所辖耕地屯田与征收籽粒数。直到1991年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张海瀛先生的研究论文发表后（《明史研究》创刊号），我才知道还存在这么一部极有价值的文献。1993年他的《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出版，将《山西丈地简明文册》全部影印附于书后，使这一原始文献得以广泛流传。

举出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治学的第一步收集史料并非易事。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在不断读书的过程中往往发现自己发表过的著作中存在缺陷和失误。知识是没有止境的，在我涉猎过的明清史领域内，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相当有限，许多问题仅具一般常识，甚至毫无所知。实事求是地对待学问，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切忌把治学看得太容易，切忌过高估计个人的能耐。至于在理论和观点问题上，则遵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必强调一律，既不想把个人看法强加于他人，也不想违心迎合某种思潮或论点。

（本文摘自《南明史》新版序言，顾诚 著，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悦读

